

人工智能训练中公开个人数据处理的域外规制

□ 罗世杰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特别是大模型的发展,使其对数据形成空前的依赖性。在海量训练语料中,公开个人数据往往可以被直接利用。这一技术实践引发较大争议:公开是否意味着可任意处理?当人工智能训练使用公开个人数据时,如何在促进创新与保护权利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问题已成为域外立法、执法、司法的关键议题。对此,欧盟、美国、新加坡形成了不同规制路径,这为理解人工智能训练中公开个人数据处理的治理趋势提供了有益参照。

欧盟：权利本位与严格规制

欧盟在人工智能训练利用公开个人数据的问题上立场鲜明,即公开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处理。其核心立法框架由《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人工智能法》和《数据法》共同构成,并辅以成员国监管机构执法实践,形成了以权利本位为中心的成本化、系统化规制模式。

确立合法基础和数据自主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处理公开个人数据必须具备合法基础。“合法利益”是实践中的常见依据,但需通过三步检验:是否存在明确利益、是否具有必要性、是否在利益衡量中不凌驾于数据主体基本权利之上。当公开个人数据涉及敏感信息时,还需满足第9条“数据主体明确公开”的例外,其处理门槛远高于未包含敏感信息的个人数据。同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13条、第14条要求数据处理器向数据主体说明数据来源、处理目的及权利行使渠道,并保障其删除权、拒绝权等。针对人工智能训练的特殊性,欧盟监管机构要求企业能够展示公开个人数据在收集、预处理、训练及输出各阶段的合规安排,并保存处理活动记录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确保数据处理活动可核验。

修法过程中引入人工智能专门规制。《数据法》强调数据可用性与公平访问,但明确不得损害既有个人数据保护秩序,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形成“可用性—权利保护”并行关系。它为跨主体的数据共享、互操作和云迁移提供框架,同时对人工智能训练中公开个人数据的流通设定边界。《人工智能法》要求公开人工智能系统满足数据治理与质量义务,确保训练数据可追溯、可解释。其中,通用目的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需履行公开训练内容摘要的透明义务,并对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模型进行风险评估与预防。

强化监管执法力度。欧盟多国监管机构已就人工智能模型大规模抓取公开个人数据开展调查和处罚。例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对利用公开人脸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的企业处以高额罚款,要求其删除数据;意大利监管机构对在训练环节不当处理公开个人数据的人工智能模型发布禁令,并处以罚款。这些案例传递的信号是:“公开”并不是免责事由,无法说明合法基础、透明性和权利救济的数据训练行为将面临强监管。

总体而言,欧盟形成了“权利本位、全程透明、强制问责”的治理蓝图。其目标在于确保人工智能训练中公开个人数据的可解释性、可追溯性与可救济性。这种模式在人工智能数据治理中凸显出以权利保护为核心的制度取向,但也显著提高了企业合规成本。

美国：宽松利用与多元治理

美国对人工智能训练处理公开个人数据的规制相较于欧盟更为宽松,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特点。由于缺乏统一的联邦立法,美国的数据治理法律框架主要依赖各州立法、行业自律以及司法判例,联邦监管机构在部分重点领域提出原则性指导,但整体上以鼓励创新为主。

联邦政策指引与宽松的立法态度。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的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展开调查,强调企业必须在透明度、公平性和安全性方面承担责任。《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作为一份非强制性政策文件,提出了尊重数据主体、确保透明和防止歧视的原则,虽不具有强制效力,但反映了联邦层面面对公开个人数据治理的价值导向。在立法层面,少数州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地方性法规,其中以《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及后续修订最具代表性。该法虽然赋予作为数据主体的消费者访问、更正和删除其数据的权利,但在公开个人数据方面设定了豁免条款,即一旦数据已向公众公开,公众在对其进行利用时可以享有更大自由。

行业自律与技术规范作为规制主力。

在缺乏统一立法的背景下,行业协会和企业自律成为约束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主要手段。部分科技企业通过制定内部准则和合规政策,对人工智能训练中处理公开个人数据的活动设定一定限制,例如标注数据来源、允许用户提出删除请求等。然而,这些自律措施缺乏强制力,更多是对社会舆论压力和潜在法律风险的回应,而非严格的外部约束。

司法判例的间接规制。近年来,多起涉及人工智能训练的案件引发关注。Getty Images 诉 Stability AI 一案,虽然核心争议点在于版权侵权,但实质上亦涉及在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是否可以不经同意使用含有人像的公开个人数据。部分州法院还对人工智能企业通过网络抓取方式大规模采集公开个人数据提出质疑,认为其可能违反消费者保护或反不正当竞争规则。由此可见,虽然缺乏统一的法律框架,但司法判例正逐渐成为美国治理公开个人数据处理的重要法律路径。

美国的规制路径展现出“宽松管制、分散约束、多元治理”的特征。然而,这种宽松模式也带来显著风险:一方面,缺乏统一立法使得数据主体在不同州享有的数据权利差异较大,而数据在跨州流动中容易出现监管盲区;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过度依赖公开个人数据进行训练,可能加剧隐私侵害与歧视性偏差的风险。

新加坡：审慎开放与风险导向

相较于欧盟的严格约束与美国的宽松治理,新加坡更倾向于风险可控前提下的审慎开放路径。其以风险防范和合规责任为核心,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多层政策工具协同运作,形成兼具模型创新与数据保护的治理框架。

风险导向的立法逻辑。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人工智能训练中处理公开个人数据须遵循合法收集、合理处理与目的限定原则。其通过“合理预期”与“合理目的”标准来判断公开个人数据处理行为的正当性,即只要处理行为与数据主体的合理预期相一致且在风险可控范围内,便具有较高的法律包容性。同时,在立法层面通过推出监管沙盒及试点机制,为企业在特定场景中利用公开个人数据开展人工智能训练提供制度空间,但要求明确责任主体、风险控制方案与退出机制,以确

保人工智能训练活动具备可追溯性与可干预性。

制度更新下的规制强化。2020年修订后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更为明确的问责原则,要求数据处理器建立内部合规体系,包括数据治理流程、风险评估机制与违规应对程序。尤其当公开个人数据被用于涉及显著风险的应用场景(如生物识别、行为画像等)时,其应开展数据保护影响评估,并就数据处理范围、保存周期与跨境传输作出明确说明。此外,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还发布了“人工智能验证”测试工具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型框架》,在法律之外构建起技术与治理双重支撑机制,强调可披露、可解释、可验证与可审计。

实践层面的周期性监管机制。在公开个人数据的监管实践中,新加坡采取“企业问责、政府监督、公众救济”的协同路径。事前环节强调企业承担主体责任,如制定数据治理方案、设立数据保护官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事中环节通过强制性违规通报、定期审查与随机检查来加强监督;事后环节则允许数据主体申请纠正、限制处理或提出投诉,由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进行调查与制裁。新加坡并未对人工智能训练全面禁限,但其监管更突出“对高风险用途严控、对低风险用途适度开放”的差异化原则,尤其在数据跨境传输方面,要求接收方具备相当水平的保护措施,并可追究责任主体。

新加坡通过风险评估、责任机制与技术标准化路径,为人工智能训练中公开个人数据的处理提供了安全底线与制度弹性。然而,其仍面临人工智能训练的不透明性削弱风险评估与可解释机制的有效性,以及问责机制的落地取决于数据处理者能力差异与监管资源配置等挑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区块链技术安全风险防范法律机制研究”(立项编号:24FFXB0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法学院)



马来西亚《零工工人法案》概览

□ 高蒙蒙

2025年9月9日,马来西亚下议院通过《零工工人法案》(以下简称《法案》),标志着该国在零工经济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法案》明确规定了零工工人与合同实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并创建专门的争议解决机制与治理结构,旨在通过规范服务协议、保障基本权利和提供有效救济途径,为马来西亚零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立法背景

社会经济背景。随着科技进步与互联网应用的广泛普及,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经济体,其零工劳动者人数持续增长,尤其在网约车、外卖配送、自由职业等领域表现显著。零工经济虽然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方式,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而传统的劳动法未能充分覆盖这种新型劳动关系,导致零工工人在劳动权益保障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

政治政策背景。马来西亚长期以来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强调创新、包容与公平的重要性,政府明确表示将通过政策与立法手段保障各类劳动者权益,特别是针对日益壮大的零工工人群体。

法律制度背景。马来西亚主要依据《1955年雇佣法》与《1967年劳资关系法》等传统劳动法来规范劳动关系,但这些法律难以完全适用于“零工”等新兴劳动形态。零工工人既不符合传统雇员的定义,也不完全属于自雇人士,导致对其进行权利保障存在法律空白。

主要内容

核心定义。《法案》首先对零工工人、合同实体、平台提供者等概念作出界定。“零工工人”是指马来西亚公民或永久居民,通过与合同实体签订服务协议以换取报酬的个体。他们通常不与单一雇主建立长期雇佣关系,而是根据具体服务需求与合同实体开展一次性或短期合作,因此不属于传统劳动法意义上的雇员,不享有全部雇员权益,而被视为独立的法律主

体。“合同实体”是指任何与零工工人订立服务协议并支付报酬的主体,包括个人、法人团体及平台提供者。这些实体通常涵盖商业平台、外包机构或自由职业中介等,负责分派任务并履行支付义务。“平台提供者”是指运营数字中介系统、连接服务需求方与零工工人的组织。他们不仅是“劳动市场中介”,还对零工工人的工作安排、服务评价及任务分配进行管理,并告知其系统规则及可能产生的后果。通过核心概念的界定,《法案》在明确各方法律地位的同时,消除了平台经济中存在的责任不清和权利模糊的问题,为零工工人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保障。

服务协议的规范化。《法案》第3条规定服务协议必须包含的基本内容,不仅包括双方基本信息、协议有效期及服务内容等基础条款,还包括收入计算标准、支付周期与具体方式,以及小费、奖励或其他附加福利的分配机制。在协议效力方面,《法案》第5条创设了“合法性审查”机制,即任何对零工工人权益保障低于《法案》设定标准的协议条款将自动失效,并由《法案》的默示条款予以替代。这加强了对零工工人的保护力度,防止合同实体利用优势地位通过格式条款排除法定责任。针对法律过渡期间的特殊情况,《法案》对既有服务协议作出妥善安排,所有在法律上依然有效存续的既有协议,可继续执行至约定期限届满,但在此期间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将自动适用《法案》的有关规定。此外,《法案》还允许合同实体与工人约定较《法案》规定更有利于工人的条款,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前提下为双方的意思自治保留了适当空间。

零工工人的权利与合同实体的义务。《法案》第8条规定,零工工人享有知情权、报酬获取权、协议变更协商权、不被无故终止服务权以及获得争议解决机制保障五项基本权利。在此基础上,《法案》还要求平台提供者必须告知零工工人电子自动化监控与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及相应后果,并提供有效的人工复核渠道。《法案》第9条规定,合同实体不得在协议中设置限制工人与其他平台合作的排他性条款,不得在任务分配、工作条件或报酬支

付方面实施歧视性待遇,不得无合理理由单方面终止服务协议等。这些禁止性规定从反面划定了合同实体的行为边界,防止合同实体滥用优势地位损害工人权益。同时,《法案》规定任何旨在限制或排除零工工人组建、加入工会或参与相关活动的协议条款均属无效。在报酬保障方面,《法案》设立了默认支付规则,若合同实体未在协议中约定报酬支付期限,须在服务完成后七日内支付工人报酬,违反此规定即构成违法。

多层次争议解决机制。《法案》构建了一个由内到外、从行政到司法的递进式纠纷处理体系。当零工工人与合同实体就服务协议履行产生争议时,工人有权向对方提交书面投诉,若该合同实体并非个人或独资企业,则必须通过协议中约定的内部纠纷处理机制,在投诉提出后30日内推进争议解决。若内部程序未能解决争议,案件则转入强制性行政调解阶段。零工工人可以申请调解员介入,若双方经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即产生法律约束力;若调解失败,案件将自动移送零工工作者法庭审理,实现行政调解与司法程序的无缝衔接。

《法案》的一大亮点是设立零工工作者法庭,负责审理零工服务相关争议。法庭采取简易程序,原则上不允许律师代理,但允许工人由工会代表或家属陪同参与,大幅降低了诉讼门槛。法庭除可判决金钱赔偿外,亦有权命令合同实体继续履行协议、恢复平台系统访问权限或修改不当条款等,为零工工人提供了灵活全面的救济。为强化判决效力,《法案》规定拒不履行法庭判决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或将面临最高不超过5万林吉特罚金或两年监禁,或两者并处。此外,《法案》第44条规定任何一方对零工工作者法庭判决不服,可在判决公布后14日内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该机制在维护司法终局性的同时,也为当事人尤其是零工工人提供了权利救济机会,进一步夯实零工权益保障防线。

社会保障与职业安全。在社会保障方面,《法案》规定平台型合同实体须为零工工人办理自雇人士社会保险计划登记,

并依法从工人报酬中代为扣缴社保费用。为确保制度落实,平台需建立与社保机构互联的数据系统,方便工人实时查询缴费记录。值得关注的是,《法案》设计了弹性缴费机制,若扣缴金额未达法定最低标准,平台需及时通知工人补足差额;若超过最低标准,工人则有权自主选择超额部分的处理方式。在职业健康安全方面,《法案》要求合同实体承担系统化的安全管理责任,具体包括评估工作环境与流程风险、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设备与设施、提供充分的安全指导与培训。在事故与疾病处理上,《法案》规定合同实体一旦发现工人在履职期间产生工伤或职业病,必须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

监管与执法。《法案》设立协商委员会作为政策协调中枢,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合同实体、零工工人代表等,核心职能是就最低收入标准、行业规范、特定豁免情形认定等议题向政府提供决策建议,为零工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沟通平台。在监管架构方面,《法案》确立了以劳工总监为核心的行政监管体系,劳工总监负责监督各方履行义务、执行法庭裁决,并推动落实相关细则。为强化执法效能,劳工总监可根据需求委任具备专业资质的调查与执法官员,这些官员有权进入工作场所检查、调取文件并对涉嫌违法行为开展调查。在执法方式上,《法案》引入了具有实用价值的和解程序。根据规定,经检察官书面许可后,劳工总监可对符合条件的违法行为提出和解方案,当事人只需在指定期限内,向主管部门支付不超过该违法行为最高罚款金额50%的款项,即可终止后续法律程序。这种柔性执法手段既缓解了司法系统的压力,也为轻微违法行为提供了高效的处理渠道。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域外法治

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日趋多元的转型时期,诉讼案件数量增长与司法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凸显,域外各国日益重视通过灵活、多元的方式缓解诉讼压力、解决矛盾纠纷。法院附设调解,即由法院附设或委托独立的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其作为一项重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程序灵活简便、成本低廉以及强调协商合作、弱化对抗冲突等显著优势。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既保持了调解的自愿性、灵活性与保密性,又强化了调解的规范性以及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有助于提升纠纷解决的效率,是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与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重要制度载体。域外许多国家逐渐建立和完善了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积累了一定经验。

启动程序

强制型启动。即针对当事人起诉的纠纷,法院要求纠纷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必须先进行调解。强制型启动在不同国家适用的案件类型不尽相同,其具体适用范围往往取决于各国的法律体系、司法传统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平衡考量。部分国家对强制型启动所适用的案件类型进行了严格限制。根据《韩国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仅对部分类型的家事纠纷适用强制型启动。但也有部分国家适用的案件类型较广。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15a条的规定,地方法院受理的金额不超过750欧元的金钱或等值物的财产权争议、邻里争议(涉及经营活动的除外)、未通过报刊或广播实施的侵害个人名誉而产生的权利主张争议,以及涉及《一般平等法》第3条所规定权利主张的争议适用强制型启动。

任意型启动。即主体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启动法院附设调解以解决矛盾纠纷。根据启动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当事人申请启动和法官转介启动。当事人申请启动是指当事人主动申请启动法院附设调解以解决矛盾纠纷。法官转介启动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法官在审查案件性质、争议焦点及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认为该案适宜通过调解方式解决,遂依职权或依申请将案件转入法院附设的调解程序。不同国家对法官转介启动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8条的规定,设立在法院内的调解机制程序灵活,法院一般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决定进行调解。但也有部分国家对法官转介启动作出限制,《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31-1条规定,法官在征得所有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将案件交由第三人进行调解。

调解主体

调解主体的分类。根据调解主体是否包括法官,可以将法院附设调解主体分为两类。一类包括法官在内,即法官可以作为调解主体调解纠纷。《韩国民事调解法》第7条规定,调解主体包括调解承办法官、常任调解委员、调解委员会,以及受法院任命的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另一类不包括法官在内,即法官不能作为调解主体参与调解。《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31-4条规定,调解可委托给自然人或法人。若指定的调解主体为法人,其法定代表人应将在该法人内部并以法人名义履行调解职责的自然人姓名,报请法官批准。这表明法国法官不直接作为调解主体参与调解,而是负责指定或批准调解主体。

调解主体的选择。部分国家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调解主体。2018年希腊颁布的《关于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调整方案的规定》中第178条至第206条是关于民事和商事调解制度的规定,其中第183条第2款规定调解员由当事人或其共同委托的第三人指定。一些国家规定当事人只能在规定的人员中选择调解主体,若当事人在选择调解主体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则直接指定调解主体。《葡萄牙治安法院法》第5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司法部许可且治安法院公布的调解员名单中选择调解员主持调解,若当事人未能就调解员的选择达成一致意见,则由秘书处指定。

调解过程

调解程序的设置。部分国家明确规定了调解的具体程序。《葡萄牙调解法》第16条规定,调解程序包含初次接触环节,用于安排预调解会议。该环节具有信息告知性质,调解员需明确说明调解机制运作方式及程序规则。调解协议由各方及调解员共同签署。但也有部分国家未作出明确规定。《澳大利亚民事纠纷解决法》未规定统一的调解程序,当事人可自主设定调解程序,在某些情形下调解员也可向当事人提出建议。《爱尔兰调解法》也未规定调解的具体程序,仅罗列了指导调解具体程序的基本原则。

替代调解决定的作出。部分国家规定调解主体在调解过程中可以作出替代调解决定。《韩国民事调解法》第30条规定,对于未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或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内容不适当的案件,由负责调解的法官在不违背申请人申请宗旨的情况下,依职权作出公平解决案件的调解决定。但也有部分国家对此予以禁止。希腊《关于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调整方案的规定》第189条第2款规定,调解员应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强迫当事人接受其个人倾向的解决方案。调解员仅可在所有当事人均同意的前提下,分享其个人观点,但该观点不具有约束力。

调解效力

调解协议达成即具有强制执行力。根据《韩国民事调解法》第29条、第34条第4款的规定,调解成立或者替代调解的决定得到确定,与裁判上的和解具有同等效力。同样,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94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或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为解决法律争议,就争议标的全部或部分,在德国法院或由州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或认可的调解机构达成的和解协议,可以作为强制执行力的依据。

调解协议经相关机构认可后具有强制执行力。西班牙的相关法律并没有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调解协议若要获得强制执行力,需要当事人请求法院许可可调解协议,或者请求公证处对调解协议进行公证。根据希腊《关于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调整方案的规定》第184条第4款的规定,如果调解记录包含当事人关于可强制执行债权存在的合意,那么自调解记录在初审法院登记之日起,具有强制执行力。根据《葡萄牙治安法院法》第56条第1款的规定,若当事人达成和解,应将和解协议记录为书面形式,并由所有参与方签字,协议经治安法官批准后具有判决效力,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本文系2025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中研究生科研创新平台项目“县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5106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